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南宁市園門路)

广西僮族自治区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第一號

广西僮族自治区新华書店發行

广西僮族自治区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4 $\frac{1}{8}$ 印张 • 01千字

1961年5月第一版

1961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250册

統一書號: 3113 • 149

定 价: (4) 0.28元

目 录

毛澤东同志論調查研究·····	解放軍報編輯部輯录 (1)
大兴調查研究之风, 一切从实际 出发·····	紅旗雜誌社論 (20)
大兴調查研究之风·····	人民日報社論 (30)
从实际出发·····	人民日報社論 (36)
附: 从实际出发正确指揮生产	
学习随县同志实事求是的精神·····	人民日報社論 (44)
附: 随县粮食連年增产	
种植計劃必須实事求是·····	人民日報社論 (49)
向老农問計·····	人民日報社論 (53)
附: 平順堅持請老农当顧問的制度	
了解情况是做好工作的前提·····	人民日報社論 (58)
附: 吉林化工公司提倡从实际出发的风气	
对生产实际应当深知深解·····	人民日報社論 (64)
发揚革命热情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 优良作风·····	人民日報社論 (69)
附: 丰满水电站开展“百件事故預想”活动	
坚持政治挂帅 抓紧具体措施·····	紅旗雜誌社論 (76)
一切經過試驗·····	人民日報社論 (83)
調查研究的态度·····	关 鋒 (88)
論胸中有“数”·····	吳傳启 (97)
领导农业生产必須从实际出发·····	魯 力 (108)
用科学的方法领导农业生产·····	賀作文 (117)
从实际出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	赤 布 (126)

毛泽东同志論調查研究

解放軍報編輯部輯錄

第一部分：了解情况是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是党决定实际政策的根据。調查研究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

向全党提出系統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依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經濟、財政、政治、軍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詳細的調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結論。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們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調查和研究。就要使同志們懂得，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謂認識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謂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們懂得，沒有調查就沒有发言權。夸夸其談地乱說一頓和一二三四的現象罗列，都是无用的。例如关于宣傳工作，如果不了解敌友我三方的宣傳状况，我們就无法正确地决定我們的宣傳政策。任何一个部門的工作，都必須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在全党推行調查研究的計劃，是轉變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改造我們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2頁）

上級机关要明了下級机关的情况和羣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

（“关于糾正党內的錯誤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1頁）

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叫我們看問題不要從抽象的定義出發，而要从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從分析這些事實中找出方針、政策、辦法來。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55頁）

按照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這是一切共產黨員所必須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們所犯的錯誤，研究其發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們離開了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主觀地決定自己的工作方針。

（“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06頁）

（一）教育黨員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觀主義的分析和估量。

（二）使黨員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由此來決定鬥爭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們知道離開了實際情況的調查，就要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

（“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94—95頁）

現在我們很多同志，還保存着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於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会有。

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調查社會各階級的生动情況。對於擔負指導工作的人來說，有計劃地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即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具有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最基礎的知識。

所以，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於只懂得理

論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实际相联系。“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虽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具有發言權的。有許多人，“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地發議論，提意見，这也批評，那也指責，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敗。因为这种議論或批評，沒有經過周密調查，不過是無知妄說，我們黨吃所謂“欽差大臣”的亏，是不可勝數的。而这种“欽差大臣”則是滿天飛，几乎到处都有。斯大林的話說得对：“理論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論。”当然又是他的話对：“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除了盲目的、无前途的、无遠見的实际家，是不能叫做“狹隘經驗論”的。

我現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說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羣众学习，繼續当一个小學生，这就是我的志願。

（“‘农村調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9—791頁）

象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則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績，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們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們的研究工作还是沒有系統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說，我們並沒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統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調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閉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粗枝

大叶，夸夸其談，滿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許多同志中繼續存在着。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們認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状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們的許多同志却直接違反这一真理。

（“改造我們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6—797頁）

胸中有“數”。这是說，对情况和問題一定要注意到它們的數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數量的分析。任何質量都表現为一定的數量，沒有數量也就沒有質量。我們有許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數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統計、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決定事物質量的數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數”，結果就不能不犯錯誤。例如，要进行土地改革，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貧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这些數字就必須了解，才能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对于何謂富农，何謂富裕中农，有多少剝削收入才算富农，否則就算富裕中农，这也必須找出一个數量的界限。在任何羣众运动中，羣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間状态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須有个基本的調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決定問題。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3—1444頁）

在領導方法上，方針決定了，指示发出了，中央局、分局必須同区党委、地委或自己派出的工作团，以电报、电话、車騎通訊、口头談話等方法密切联系，并且利用报纸做为自己組織和領導工作的极为重要的工具。必須隨時掌握工作进程，交流經驗，糾正錯誤，不要等數月、半年以至一年后，才开總結会，算总賬，总的糾正，这样損失太大，而隨時糾正，損失較少。在通常情況下，各中央局和下面的联系

必須力求密切，經常注意明確劃清許做和不許做的事情的界限，隨時提醒下面，使之少犯錯誤。

（“關於工商業政策”，“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84頁）

第二部分：調查研究是為了找出事物的規律，並且應用這些規律來指導自己的行動

大家明白，不論做什麼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質，它和它以外的事物的關聯，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63—164頁）

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勝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於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人們經過失敗之後，也就從失敗取得教訓，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適合於外界的規律性，人們就能變失敗為勝利，所謂“失敗者成功之母”，“吃一塹長一智”，就是這個道理。

（“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73頁）

什麼叫問題？問題就是事物的矛盾。那里有沒有解決的矛盾，那里就有問題。既有問題，你總得贊成一方面，反對另一方面，你就得把問題提出來。提出問題，首先就要對於問題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調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質是什麼，這就是發現問題的過程。大略的調查和研究可以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但是還不能解決問題。要解決問題，還須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工作和研究工作，這就是分析的過程。提出問題也要用分析，不然，對着模糊雜亂的一大堆事物的現象，你就不能知道問題即矛盾的所在。這里所講的分析過程，是指系統的周密的分析過程。常常問題

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

（“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0页）

……有一种方法是要学的，学习的时候要用这种方法，使用的时候也要用这种方法。

什么方法呢？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

许多国家颁布的军事条令书上，都指示了“按照情况活用原则”的必要，又都指示了打败仗时的处置方法。前者是不要指挥员因死用原则而主观地犯错误；后者是当着指挥员主观地犯了错误，或客观情况起了非所预料的和不可抗的变化时，告诉指挥员怎样去处置。

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人办一切事情都难免这种情形，有比较地会办和比较地不会办之分罢了。事情要求比较地会办，军事上就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反面地说，要求比较地少打败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

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不去这样做，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相情愿的基础之上，这种计划是空想的，不符合于实际的。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之所以不免于受敌人的欺瞒，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的鼓动，因而不免于碰壁，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願意知道任何军事计划，是应该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周密思索的基础之上的缘故。

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間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願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上面說的是一个战略的行动，或一个战役和战斗的行动。經驗多的軍人，假使他是虛心学习的，他摸熟了自己的部队（指揮員、战斗員、武器、給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又摸熟了敌人的部队（同样，指揮員、战斗員、武器、給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摸熟了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經濟、地理、气候等等，这样的軍人指导战

爭或作戰，就比較地有把握，比較地能打勝仗。這是在長時間內認識了敵我雙方的情況，找出了行動的規律，解決了主觀和客觀的矛盾的結果。這一認識過程是非常重要的，沒有這一種長時間的經驗，要了解 and 把握整個戰爭的規律是困難的。做一個真正能干的高級指揮員，不是初出茅廬或僅僅善于在紙上談兵的角色所能辦到的，必須在戰爭中學習才能辦得到。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71—174頁）

常常聽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務時說出來的一句話：沒有把握。為什麼沒有把握呢？因為他對於這項工作的內容和環境沒有規律性的了解，或者他從來就沒有接觸過這類工作，或者接觸得不多，因而無從談到這類工作的規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況和環境給以詳細分析之後，他就覺得比較地有了把握，願意去做這項工作。如果這個人在這項工作中經過了一個時期，他有了這項工作的經驗了，而他又是一個肯虛心體察情況的人，不是一個主觀地、片面地、表面地看問題的人，他就能夠自己做出應該怎樣進行工作的結論，他的工作勇氣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了。

（“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78頁）

任何工作任務，如果沒有一般的普遍的號召，就不能動員廣大羣眾行動起來。但如果只限於一般號召，而領導人員沒有具體地直接地從若干組織將所號召的工作深入實施，突破一點，取得經驗，然後利用這種經驗去指導其他單位，就無法考驗自己提出的一般號召是否正確，也無法充實一般號召的內容，就有使一般號召歸於落空的危險。例如一九四二年的各地整風，凡有成績者，都是採用了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

相結合的方法；凡無成績者，都是沒有採用此種方法。一九四三年的整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區黨委和地委，除提出一般號召（全年整風計劃）外，必須在自己機關中和附近機關、學校、部隊中，選擇二、三單位（不要很多），深入研究，詳細了解整風學習在這些單位的发展過程，詳細了解這些單位中若干個（也不要很多）有代表性的工作人員的政治經歷、思想特點、學習勤惰和工作優劣，並親自指導這些單位的負責人具體地解決各該單位的實際問題，借以取得經驗。一機關、一學校、一部隊內部也有若干單位，該機關、該學校、該部隊的領導人員也須這樣去做。這又是領導人員指導和學習相結合的方法。任何領導人員，凡不從下級個別單位的個別人員、個別事件取得具體經驗者，必不能向一切單位作普遍的指導。

（“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99—900頁）

報紙工作人員為了教育羣眾，首先要向羣眾學習。同志們都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往往不懂事，對於實際事物往往沒有經歷，或者經歷很少。你們對於一九三三年制訂的“怎樣分析農村階級”的小冊子，就看不大懂；這一點，農民比你們強，只要給他們一說就都懂得了。崞縣兩個區的農民一百八十多人，開了五天會，解決了分配土地中的許多問題。假如你們的編輯部來討論那些問題，恐怕兩個星期也解決不了。原因很簡單，那些問題你們不懂得。要使不懂得變成懂得，就要去做去看，這就是學習。報社的同志應當輪流出去參加一個時期的羣眾工作，參加一個時期的土地改革工作，這是很必要的。在沒有出去參加羣眾工作的时候，也應當多聽多看關於羣眾運動的材料，並且下工夫研究這些材料。我

們練兵的口號是：“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戰士們有很多打仗的實際經驗。當官的要向戰士學習，把別人的經驗變成自己的，他的本領就大了。報社的同志也要經常向下邊反映上來的材料學習，慢慢地使自己的實際知識豐富起來，使自己成為有經驗的人。這樣，你們的工作才能夠做好，你們才能擔負起教育羣眾的任務。

（“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19頁）

為了反復地說明這個意思，我想將兩種互相對立的态度對照地講一下。

第一種：主觀主義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統的周密的研
究，單凭主觀熱情去工作，對於中國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斷歷史，只懂得希臘，不懂得中國，
對於中國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團。在这种态度下，就是
抽象地無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不是為了解
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策略問題而到馬克思、恩格斯、
列寧、斯大林那裡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而是為了單純
地學理論而去學理論。不是有的放矢，而是無的放矢。馬克
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教導我們說：應當從客觀存在著
的實際事物出發，從其中引出規律，作為我們行動的嚮導。
為此目的，就要象馬克思所說的詳細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學
的分析和綜合的研究。我們的許多人却是相反，不去這樣
做。其中許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們對於研究今天的
中國和昨天的中國一概無興趣，只把興趣放在脫離實際的空
洞的“理論”研究上。許多人是做實際工作的，他們也不注
意客觀情況的研究，往往單凭熱情，把感想當政策。這兩種

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講演，則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則夸夸其談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們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导革命，則害了革命。

第二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說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所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要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結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从它找立場，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我們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們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須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書本，

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結論。这种結論，不是甲乙丙丁的現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談的盛調文章，而是科学的結論。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嘩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論和实际統一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碼應該具備的态度。

（“改造我們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9—802頁）

第三部分：調查研究必須应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 观点和方法

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們善于应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學說，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才叫做理論和实际相联系。

（“整頓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2頁）

只会片面地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詞句，而不会运用他們的立場、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問題和解决中国革命問題。这种对待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級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改造我們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7頁）

我們看問題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績和缺点的界限。記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則就会把問題的性質弄混淆了。自然，要把界限划好，必須經過細致的研究和分析。我們对于每一个人和每一

件事，都應該採取分析研究的態度。

（“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45頁）

有些同志，從資產階級、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出發，錯誤地觀察了農工聯盟這樣一個極端重要的問題。他們認為目前合作化運動的情況很危險，他們勸我們從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趕快下馬”。他們向我們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趕快下馬，就有破壞農工聯盟的危險。”我們認為恰好相反，如果不趕快上馬，就有破壞農工聯盟的危險，這裡看來只有一字之差，一個要下馬，一個要上馬，卻是表現了兩條路線的分歧。

（“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第30頁）

要做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和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的。

第二是開調查會。東張西望，道聽途說，決然得不到什麼完全的知識。我用開調查會的方法得來的材料，湖南的幾個，井岡山的幾個，都失掉了。這裡印的，主要的是是一個“興國調查”，一個“長岡鄉調查”和一個“才溪鄉調查”。開調查會，是最簡單易行又最忠實可靠的方法，我用這個方法得了很大的益處，這是比較什麼大學還要高明的學校。到會的人，應是真正有經驗的中級和下級的幹部，或老百姓。我在湖南五縣調查和井岡山兩縣調查，找的是各縣中級負責幹部，尋鄉調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級幹部，一部分下級幹部，一個窮秀才，一個破產了的商會會長，一個在知縣衙門管錢糧的已經失了業的小官吏。他們都給了我很多聞所未聞的知識，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國監獄全部腐敗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縣作調查時該縣的一個小獄吏。興國調查和長岡、才溪兩

乡調查，找的是乡級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獄吏、商人和錢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給他們当学生是必須恭謹勤勞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开調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人即夠。必須給予時間，必須有調查綱目，还必须自己口問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討論。因此，沒有滿腔的热忱，沒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須明白：羣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农村調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0頁）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屬正确的领导，必須是从羣众中来，到羣众中去。这就是說，將羣众的意見（分散的无系統的意見）集中起来（經過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羣众中去作宣傳解釋，化为羣众的意見，使羣众坚持下去，見之于行动，并在羣众行动中考驗这些意見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羣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羣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馬克思主义的認識論。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問題”，“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1頁）

只有代表羣众才能教育羣众，只有做羣众的学生才能做羣众的先生。

（“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5—866頁）

“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諸葛亮”，这就是說，羣众有伟大的創造力。中国人民中間，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鎮，都有那里的“諸葛亮”。我們